



1932年由德和洋行设计的仁济医院老楼,一直沿用至今

医院初办 种痘戒毒 传播西医

1843年11月,32岁的传教士兼医师威廉·洛克哈脱来到上海,开展教会医事工作。1844年2月他先在城内大东门租借民宅办诊所,同年10月迁到南门外比较宽大的一所能容纳20个病人的四合院,定名“中国医院”。在医院的最初8个月,约有8000人接受治疗,其中男病人约占五分之四。

洛克哈脱决定将医院向英租界转移。他用私人诊疗费220银元于1845年12月购买了一块地约五亩半(今福建路山东路间)。1846年7月,新医院落成,定名为“仁济医院”,取仁爱济世之义,亦称山东路医院。开业初的洛克哈脱实在太忙了,即使加班加点仍难以应付,他聘请了一位名叫黄春甫的本地外科医生协助他,黄春甫也是上海滩最早的华人西医师。1850年伦敦会在城内某住宅内另僻一诊所,由黄春甫负责,洛克哈脱每周去诊治数次,医疗工作局限于简单的外伤处理,脓肿切开引流等小手术。

仁济医院初建立时,推广牛痘接种成为主要工作。当时,中国民众对于西医教会的拯救形式因不了解而感到恐怖。黄春甫主动讲解健康和公共卫生知识。他的种痘手法极娴熟:“用最薄、犀利小刀割开前臂外皮,将痘浆点入,须令自干,且不可擦去。三四日后,即于所割处起水泡发浆,并不延及他处。经数日即结痂脱落,小儿并无所苦,嬉笑如常。并不避风忌口,真良法也。”在全力接种牛痘同时,黄春甫还注重“传帮带”,培训了大批“赤脚医生”,让他们熟练掌握接种技术后,到外地和乡村为更多儿童服务。仁济医院由于种痘服务很快声名远播。

建院伊始,仁济医馆收治了大量鸦片成瘾的患者。洛克哈脱摸索和总结出一些颇为实用有效的戒烟方法。他告诫患者要坚持不吸食鸦片,同时辅以鸦片丸和樟脑丸以治疗。针对戒烟过程中伴有的明显腹泻症状,洛克哈脱同时给予收敛剂,如石榴皮粉末、奎宁,再配以一些刺激性的东西,让病人节食。在给鸦片药丸几天后,肠道的不适感会逐渐消退,然后鸦片药丸的量逐渐减少到完全不用,奎宁继续用到完全病好。依靠这种方法,仁济医馆成功地帮助了几千例鸦片成瘾者戒除了毒瘾,其中大部分都被治愈。1874年,洛克哈脱在回国后撰写了《鸦片速改七戒文》,揭露鸦片毒害之深,介绍自己在中国的戒毒治疗经验,大力宣传戒烟。

1857年,合信(Benjamin Hobson)任第二任院长,他也坚持戒毒治疗。他在自己翻译出版的《西医略论》的“戒鸦片烟瘾论”一节中揭露了鸦片的危害,并记录了戒鸦片毒瘾的方法:“间有泻痢身不安者,服收敛全补药,如黄连、金鸡纳

之类,或樟脑、桂皮酒补精神,食牛羊肉鸡子牛乳之类,数日瘾不发,即可戒尽。若身虚不能速戒,可用缓戒之法,日减一日,减极瘾除。”

这个时期的仁济在合信院长的推动下致力于西医理论在中国的传播,卓有成效。他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,第一次将西方医学书系统翻译成中文,合称《医书五种》,他用募捐到的经费出版了800本中文医学字典和5000本现代医学丛书。这是国内首部西医著作,标志着西医学理论正式输入中国。至今上海历史博物馆还收藏着其中由仁济医院于1858年(咸丰七年)出版的《西医略论》和《妇婴新说》。

无论哪个时代,仁济人总是敢创时代之先,成为中国医学事业的领跑者之一。1849年的仁济,就开始用氯仿进行外科手术;1876年医院所有较大的外科手术均在无菌情况下进行。仁济医院在国内开创了外科消毒法的先河。

1894年,仁济开出40张床位的女病房,伦敦教会派来了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海莉(Miss Halley)担任医院的总护士长。同年,她以女病房为基地开始招收中国妇女进行护士职业培训。1896年,医院开办高级看护学校,正式将西方的医疗护理模式也整套移到中国,对中国的护理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1914年,爱丽丝·克拉克(Miss Alice Clark)正式创办“仁济私立高级护士学校”,并向当时刚成立的中华护士学会正式注册,是当时中国最早最大的护校之一。

1904年,谈文卜(C.J. Davenport)出任院长,在他长达22年的任职经历中,不仅购地使医院占地面积扩大到8.74亩、重建女病房、让医院的硬件设施大为改善,使仁济的内科得到长足发展,如结核病、伤寒、痢疾等疾病的诊治水平领先业界。1922年仁济医院已经拥有了中国第一架X光机,为当时许多疾病的及时诊断奠定基础。



合信编纂的三本医书,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部系统介绍西医理论的书籍



一九三三年的仁济医院大病房

仁济医院：中国西医的摇篮

王瑜明 袁蕊芸



William Lockhart 雒魏林(1811-1896),仁济医院创始人,1844-1856年为医院主治医师院长

洋医传教,西医东渐,这是中国西文史的开端,也是上海仁济医院悠长历史的开头。1844年2月,英国传教医师威廉·洛克哈脱(William Lockhart)在大东门外的一栋小小民宅内开办了“雒氏诊所”,这是仁济医院的前身,上海第一家、中国第二家西医院在这里悄然开张。直到1905年之前,仁济医院一直免费施医舍药,被当时的百姓感激地称为“施医院”。



最大的赞助商雷士德



雒魏林最得意的“洋”学生黄春甫,他的努力使接种牛痘的工作由上海推广至全国

飞速发展 建新院、设专科

1926年5月14日,上海有位富有的英国侨民雷士德病故,他是位建筑师,1874年的仁济医院新院舍就出自他的设计。医院多年来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,他在遗嘱中留给仁济医院100万银元用于重建新院,同时将老西门、北京路、浙江路等四处房地产赠予仁济,其收益指定为补助医院经常开支之用。其善举解决了当时医院重新建造所需资金。1932年,由德和洋行设计并历时3年建造的新院竣工启用,建筑总面积为13808平方米,开设200张床位。整栋建筑为6层钢筋混凝土结构,部分为七层,门诊、药房、病房、教学楼、手术室、研究院、医疗辅助室、宿舍一应俱全。这栋建筑至今屹立在山东中路145号仁济西院。1934年病床增加至250张,仁

济医院成为上海最大医院之一。

新建筑为医院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硬件。1937年叶衍庆自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回国开设了骨科病房,这是上海最早设立的骨科病房。20世纪20年代后期妇产科独立建科,五官科、齿科、皮肤科也均开设门诊。放射科有两台X光机,供透视和摄片用。此为仁济医院重建后的全盛时期。

正当医院加快发展之际,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略我国。仅三天就有200多名严重受伤平民收入病房,还有大量伤员需经急救处理。受战争影响,来院求治者增多,医护力量不足,社会捐助减少,经费拮据,医院陷入困境。不久,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伦敦教会已无力调派医护人员来院,医护工作主要由中国医务人员承担。

日军侵占 被接管、业务衰退

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。数日后仁济医院的事务、药局两个部门就由日军派员控制。1942年9月2日,日军正式接管仁济医院,委托同仁会华中支部接管。同仁会受命后,成立了接管委员会进驻医院,强行接管。

也因不甘忍受日本人的统治而离院。日本军方从日本帝国大学征调3名医学博士来院,另有几名日本护士来院担任护士长及手术室、各病房护士长,其业务水平是不能与仁济医院护士相比的。由于仁济医院医护力量大为削弱,加上有些日本医务人员以占领者姿态,趾高气扬,医疗作风恶劣,不仅住院病人减少,门诊病人也大幅下降,与接管前相比,门诊由日均四五百人下降为280人左右,到1943年全年平均日门诊量只有200人左右。医院业务出现严重衰退。

时隔不久,英国职员被“引渡”进集中营。英国职员的院内宿舍及院外住宅以及雷士德研究院和实验室,全由日本人霸占为宿舍。日本人接管后,在医院四周架设铁丝网,医院如同兵营,职工出入均受监视。日本人接管后,中国高级医师如叶衍庆、钱建初、兰锡纯等为保持民族气节先后离开。他们或到社会上去开业谋生,为同胞服务,或去其他医院工作。一些护士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,仁济医院的职工欣喜若狂,仁济医院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。

国人主管 建章立制 强大专家阵容

1945年9月26日,上海市卫生局委派仁济医院特约医师、泌尿外科专家陈邦典为接收委员接收仁济医院。1946年5月9日仁济医院董事会公推颜惠庆为董事会主席,委任陈邦典为院长,将医院组织章程及董事会组成名单呈报上海市卫生局立案批准,卫生局长遂将仁济医院移交董事会管理。重新组建的董事会,由颜惠庆、丁贵唐、刁信德等华籍董事16人与英籍董事9人组成。抗战胜利后,仁济医院开设多个专科门诊。至1946年底,日门诊平均600人次,床位数增至333张。

1945年,在时任院长陈邦典的带领下,全体职工经讨论制定了《仁济医院医德信条》12条,对医护人员的行为规范、医者生活习性、品格加以约束。1945年11月制定“总住院医师规则”和病历审查制度。1945年下半年起仁济医院接受圣约翰大学医学院、同德和东南医学院学生的临床见习和实习。由叶衍庆、钱建初、邱少陵、陈邦典等医师亲自带教。医院还加强了住院医师培养和考核制度。这些制度为解放后仁济医院成为上海第二医学院教学医院打下基础。

最美护士

相关链接

有种说法称“仁济的护士最漂亮”。成立于1894年的“仁济医院看护班”是上海第一所女子职业技术学校,不仅“入学考试难”“对相貌也有要求”。1914年,随着看护班规模渐大,“仁济私立高级护士学校”应运而生,这是我国最早注册的护校之一,也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、教学质量最好的护校之一。史料称,应考仁济护校的条件相对较严,规定18至30岁,未婚。护校的学生毕业后择优留在本院工作,留院者不能结婚,因为当时护士需住在医院宿舍,一个月夜班,一个月日班,如此循环。

如要结婚就得辞职。有些珍惜自己专业的护士只能坚持独身,甚至终身奉献于护理事业。大多数学生来自开明的家庭,且具备一定经济基础。护校学制3年,每年都有学生因不适宜当护士被退学。仁济医院护理前辈夏韵川回忆,当年入学时班里有32名学生,半年预科后淘汰至28名,3年后毕业人数为19名。在仁济护校时,她们一直受到这样的教育:“不论你们多么年轻,病人的年龄有多大,在病房里,应像母亲对待孩子一样爱护病人,关心、照顾他们,把你们学到的知识无遗漏地运用到工作中去。”



1945届仁济护校毕业照